

郑观应思想发展论

夏 东 元

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三年)^①,字正翔,号陶斋,又号待鹤山人,广东香山县人。他是一位富有社会实践尤其是经营近代工商业实践的民族资本家,也是在中国近代思想界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毛泽东同志说:“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郑观应是站在新文化方面与旧文化作斗争的人们中,有比较完整思想体系的较早的代表。他的思想有不少精髓的地方,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一)

郑观应的有进步倾向的思想体系,发端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完成于九十年代。在这近四十年间,正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步步深入,中国从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决定性时刻。郑观应在這段时间里,前二十年先后在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职务和自己经营商业,后十几年除八十年代后半期几年间基本上过着隐居生活外,主要在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汉阳铁厂等洋务企业中任总办帮办等职。

郑观应的著作很多,但影响最大最能代表他的主导思想的是《盛世危言》一书。而他的思想发展变化,不少表现在《盛世危言》的不同版本上。因此,首先谈一下《盛世危言》的版本是有必要的。

《盛世危言》的版本很多,我所看到的已有十几种,但多数是在一八九五年后几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高潮中坊间书贾改头加尾印行的,不一定都经过郑观应同意。我认为由郑观应手定的能代表郑的思想发展的,应当是《救时揭要》、《易言》二十篇本(下简称“《易言》(20)”)、《易言》三十六篇本(下简称“《易言》(36)”)、《盛世危言》五卷本(下简称“《危言》(5)”)、《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十四卷本(下简称“《危言》(14)”)、《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八卷本(下简称“《危言》(8)”)。

郑观应本来是一个小知识分子,他自己说“小试不售”,即奉父亲命于十七岁那年(一八五八年)“赴沪学贾”。^②“学贾”并非他的始愿,是因为“家贫作贾,负米娱亲”^③。到上海本想入英文书馆读书,未能如愿,乃在新德洋行买办、他的叔叔郑廷江(秀山)处“供走奔之劳”。^④接着,郑观应通过他的姻亲宝顺洋行总买办曾寄圃和世好徐润的关系,介绍到了宝顺洋行。^⑤这时,英法美俄等国不满足于一八五八年签订的《天津条约》的侵略权益,正在再次燃起战火,阴谋开皇帝眼皮底下的天津为通商口岸,英美等国商人急于了解天津的商业情况,郑观应在一八五九年冬天跟随宝顺洋行洋人坐帆船赴天津考察商务,在津度岁后返沪,即在宝顺管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宜,直至一八六八年宝顺洋行停业。

一八六〇年前后,正是英法联军侵略战争造成中国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关心时务热心救世而又屈身买办的郑观应写成《救时揭要》,据郑自己说,一八六二年将《揭要》交给徐润称之为“历年同办公益善举”的江苏余莲村(名治)刊印。“先传至日本,即行翻刻”^⑥,可见影响是较大的。从此书的序文看^⑦,郑的指导思想是要治人心,劝人行善,他认为儒释道三教都是“治此心”的良药,可看出唯心主义的消极东西很多。但多数篇幅是“触景伤时,略陈利弊”的积极内容。从郑观应把《易言》作为《救时揭要》的“续集”看,他是把积极内容作为书的中心的。

《易言》有三种:一是一八七四年的三十六篇本,二是一八七六年^⑧刊印的二十篇本,三是一八八〇年的三十六篇本。郑观应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他在光绪元年“暮春之初”所写的《易言》(36)序文中说:“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讯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一个是要变,要变革清朝统治因循守旧腐朽的习俗,一个是要了解“远情”,学习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战胜外国侵略者。

郑观应在1870至1871年间写成了《易言》，在郑观应看来，要救治当时的弊病，“莫如自强为先”，而自强之道不外乎《易言》中所讲的几大端。书成，即邮寄香港就正于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王韬即为付印。署名“杞忧生”，表明忧时救世之意。书一出，马上就流传到日本、朝鲜。

《易言》(36)的刊行，对郑观应说应该庆贺，但他一方面尽量把分散出去的书收回，另一方面请沈澂人、谢家福二人参加，将三十六篇删并为二十篇。为什么要删并？郑观应自己说：“窃惧丑不自匿，僭且招尤”^⑨。“丑不自匿”是客套话，惧怕“僭且招尤”是真情，只要看一下删去的篇目就可以知道。例如他删去《论议政》《论游历》《论吏治》《论书吏》《论边防》《论练兵》等篇，这些大都是揭露抨击清朝政府军事、吏治的腐败黑幕，和关于设立议院君民共治的内容。珊溪生（按即经元善）在《易言》(36)后记中称许郑观应说：“言及吏治戎行种种积弊，不啻禹鼎铸奸，温犀烛怪”^⑩。这怎么能不“招尤”呢？尤其是主张设立议院的《论议政》，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论述比较明确的最早的一篇，它要分清王朝的权，当然是清朝专制统治者最不能接受的，又怎么敢不删去呢？这就无怪在刊印《易言》(20)时，把“杞忧生”的署名改为“慕雍山人”，正面地表明“意期再见雍熙之世”，以表白对清王朝还是忠诚的。

到了一八八〇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开始成为一种思潮，对清政府的弊政提出尖锐批评和提出设立议院的人多起来了，于是郑观应又将《易言》三十六篇原稿修订刊行，仍恢复了“杞忧生”的署名。这个本子的序言虽写于“光绪元年暮春之初”，但内容涉及到日本改琉球为冲绳^⑪等一八七五年以后的事，书的定稿当在一八七九年。从这里也可看出，这个本子并不是前一个《易言》(36)的简单重印，而是有所发展的。因为郑观应在这期间除自己经营商业外，正在太古轮船公司当买办，又处于边疆危机的时刻，对于敌情了解得更多了，在反对外国侵略和发展民族经济以进行抵制等问题上有所反映是必然的。

《盛世危言》(5)是在《易言》的基础上扩大而成的。正文五十七篇，加附录、后记三十篇，共为八十七篇。这部书在成书和刊印的时间上，不少著作中讲得不确切。一般都说《盛世危言》写成一八八四年，这是因为书的卷首有光绪十年“彭序”的原故。实际上书中许多内容是一八八四年以后的事。其中提到一八九一年俄国建筑西伯利亚铁路就是一例^⑫。在刊印时间上一般都说是一八九二年，这是因为郑观应的自序写明是光绪十八年。但书前有陈炽的“癸巳七月”的序，书末有杨毓辉“癸巳暮春之初”和吴广霁“壬辰冬”的跋语。这三个人都是《盛世危言》的参订者。郑观应在一八九五年九月说过“距作书仅年余耳，而事已迥异”的话，就算是两年，《盛世危言》(5)的印行至早当在一八九三年秋冬之间。

从一八八〇年《易言》(36)的刊行，到一八九三年《盛世危言》定稿的十三年间，是郑观应一生中变化大、挫折多的一段时间。他于一八八〇、八一年，以外国企业中的买办身分，先后担任洋务派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and 电报局的帮办总办职务，接着于一八八二年初，郑观应抛弃了太古买办的职务，转到轮船招商局任帮办，随后又任总办。郑观应天真地认为可以利用这些阵地来实现他那一套自强以抵制侵略的主张了。谁知时过不久，洋务官僚利用他在织布局的亏欠进行迫害，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把他拘禁于香港，搞得郑观应贫病交加。而这期间正是中国堕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时刻，“杞忧忠愤两不能禁”的郑观应，抱着“勿为外人所侮”的愿望，著成了《盛世危言》。此书刊行问世的时候，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民族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兴起的时候，它理所当然地受到各方面的重视。礼部尚书孙家鼐、江苏布政使邓华熙都把《盛世危言》推荐给皇上，清帝命总署印刷二千部，分送给大臣们阅看。郑观应自己排印了五百部，很快求索一空，都中各处求者还是“络绎不绝”^⑬。连洋务企业督办盛宣怀也致书郑观应说：“展诵之下，万分钦佩。……弟拟将大著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乞再分寄二十部，如能因此一开眼界，公之功亦巨矣。”^⑭外国报纸甚至宣传说《盛世危言》“所载中外各事，中华人近以该书作南针”^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盛世危言》热呢？主要是由于它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反映了人民挽救民族危亡和救国的要求。如果以之与《易言》(36)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这种反映。现以几个主要篇目为例，《盛世危言》新增了：《商战》、《银行上》、《银行下》；《海防上》、《海防下》，把《论边防》增为上中下三篇；而《论议政》表面上改名为《议院》，实际上是重写的，它明确地提出在中国实行议院制的强烈要求。对外反侵略和进行商战，在国内实行立宪，正是形势的需要。

《危言》(14)刊于乙未八月（一八九五年九、十月间），这时，清政府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起来，郑观应救时的心情更为急切，他说：“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故未

言者再尽言之”。^⑥它比《盛世危言》(5) 新增正文四十三篇, 附录未尽之词及中外通人救时之文一百十三篇。全书共为二百篇。从新增的篇目看, 主要是兵战、商战和发展经济技术等问题。例如:《商务》二、三、四、五篇,《商船》上下篇,《商战》下篇,《边防》从三篇增加为八篇。至于《危言》(8), 刊于光绪二十六年八月, 这时正是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和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并占领北京的时候, 长于观察形势并敏锐地及时有所反映的郑观应, 在修订《危言》时作某些内容增删是很自然的。它的篇数虽与《危言》(14) 相同, 但篇名则有不少变动, 特别是某些篇目例如《议院》排列次序的变化, 及与此相适应新增《原君》等篇, 很能反映郑观应的思想发展变化。

《盛世危言》版本的变化, 多少反映了郑观应思想的发展。经过郑观应手定的版本就至一九〇〇年八卷本为止, 此后他又活了二十多年, 再没有新修订的危言问世^⑦, 他此后的思想发展变化, 主要反映在诗和书札等作品中。

(二)

郑观应思想的精髓, 首先是他的变法救国和重点防俄。他的一切主张和很多活动, 大都是围绕着救国救民族这一中心的。

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 对清王朝和中华民族来说, 都是一个巨变。先进的中国人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敏感地意识到要“以变应变”, 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这只有在放眼世界的林则徐总督两广的短暂时间里付诸实践。幼芽刚刚孕育就被清朝顽固守旧派扼杀了, 林则徐本人遭到充军伊犁的迫害。世界在前进, 客观形势在迅变, 中国却原地不动。闭关自守坐井观天的顽固守旧派得胜, 国家民族遭殃, 英法联军侵略进来了, 腐朽的清政府不堪一击, 连咸丰皇帝也被赶出了皇城。侵略者的大炮再一次警醒了中国人。中国应该怎么办? 变革旧制, 弃旧图新, 开始成为一种思潮。当时主张变的有两种人, 一是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官僚, 他们也要“师夷长技”, 但他们是为了制服人民, 对外则是屈膝投降; 另一种人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主要是为了战胜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郑观应是这个变革思潮中的矫矫者。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说:“庚申之变, 目击时艰, 凡属臣民, 无不眦裂。”^⑧外国侵略者的欺凌, 清专制王朝的腐败无能, 使郑观应这个青年气愤到“眦裂”的程度, 于是有“触景伤时, 略陈利弊”内容的《救时揭要》问世了; 他“每于酒酣耳热之下, 闻可以安内攘外者, 感触于怀, 随笔割记, 历年既久, 积若干篇”,《易言》也就这样辑成了。王韬说他是“思挽时局, 幽愁积愤之所为作”^⑨, 是不过分的。

变法主要是为了御外侮, 固然可以从郑观应“闻远情, 师长技, 攻其所短, 而夺其所恃”的思想看出来, 更可以从他“防外侮”重于“防内患”的态度上得到说明。他指出, 御外侮必须“寓兵于民”, “亟宜悉照西法练民团, 使人人知兵。”这还不够, 还必须“兴艺学自精制造, 变学校以育人材。”人民组织起来了, 加上新式的人材和先进的科学技术, 才能自强, 也才能有效地御外侮。绝不能“泥古不变”, 不变, 必“终为外人欺侮挟制”。有些有先安内而后攘外思想的人, 担心武装人民会反过来威胁清朝的统治, 他们说“民心良莠不齐, 恐有意外之变。”郑观应就不是这样看法, 他说:“当今之世, 与古昔情形不同, 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⑩团结起来反对外国侵略, 就不必顾虑“有意外之变”。这种“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的思想, 到甲午战败以后更为强烈。他说:

“闭关自守, 患在内忧, 海禁宏开, 患在外侮。内忧之起, 陆军足以靖之, 外侮之来, 非海军不足以御之。……割台湾, 偿兵费, 择口通商, 丧师糜饷, 可为前车之鉴矣。犹不亟讲求兵备, 力图自强, 即欲求为贫弱而不可得, 又安望能洗丧师之耻, 复失地之仇哉!”^⑪

把人民团结起来变法以御外侮, 把御外侮放在优先的地位, 不仅与清朝顽固派先安内而后攘外、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反动论调不同, 也与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有区别。例如王韬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国今日之急务, 在治中驭外而已。治中不外乎变法自强, 驭外不外乎简公使设领事洞达洋务宣扬国威而已。”^⑫变法自强主要是为了“治中”; “驭外”呢? 不过是设领事等一些无关痛痒的软弱措施。远赶不上郑观应“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的思想。

防外侮的重点应该是谁呢? 郑观应认为“防俄宜先”。郑观应对沙俄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还在七十

年代，他就意识到沙俄的扩张主义野心，并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

“查立约诸国，最强者莫如英，而美法与俄皆堪颀颀。然英人险诈，法人桀猛，势力相敌，迹其离合，实系安危。俄则地据形胜，兵严纪律，惟以开疆拓土为心，向为诸国所忌，而尤为中华之所患。宜外与联和，内严防守，不可或忽也。”^{②⑥}

经过十余年的观察，郑观应对沙俄侵略野心的认识更为深透了。他盛赞林则徐在一八五〇年所说的“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的话，指出，近来俄国不惜巨资，修造西伯利亚铁路于“不毛之地”，“阴谋诡计，行道皆知”。为了不“坐使万里疆陲他日束手而失之强敌”，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政策。^{②⑦}在国际上，郑观应提出在自强的基础上联英日以拒俄的策略。他说：“俄人贪而无信，天下莫不知之。苟吞并朝鲜，东得志于亚洲，西必横行欧土，势同东帝，浸假而进窥印度”，这固为英人所深忌，亦为日本所不容。^{②⑧}郑观应根据上述一系列事实，而得出结论说：“防俄宜先”。^{②⑨}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郑观应大声疾呼：

“所谓岌岌乎其殆哉，正中国今日之局势矣！”这时，他曾提出“联俄”的策略，但他明确表示，其实质和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防俄。他说：“前篇谓盱衡时势，亟宜联俄以制英日，和英日以制俄，非恃俄可与英战，实欲借俄与日合，藉日和英以制俄耳。”^{③①}也即所谓“亲俄正所以弭俄”。为什么要以拒俄作为战略重点，郑观应说是因为沙俄世代执行彼得大帝“朕欲举亚洲之全境俾全服于俄”的政策缘故，所以对中国来说，沙俄是最危险的敌人。

(三)

按照郑观应的逻辑，要御外侮，必须自强，要自强，必须发展近代工商业。他虽注重兵战，但更注重商战，甚至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他认为近代工商业发展了，不仅军队有自造的新式装备，更能在市场上与外国的廉价商品相竞争。他说：“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③②}所以郑观应把自强的基点放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上。

发展近代工商业必须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郑观应是把学习“西学”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的。他早在七十年代就说：“夫欲制胜于人者，必尽知其成法而后能变通，能变通而后能克敌。”郑观应所讲的西学，主要是：算学、力学、化学、医学、军事学、工艺制造学等，此外也涉及到政治法律等学。他认为这些学问都是西方“萃数国之人材，穷百年之智力，擲亿万之资财，而后得之。”把人家已有的对富强行之有效的成果拿过来，是一个捷径。他极力主张把西方有用的书赶紧翻译成中文，颁行天下，广设书院，使“人人皆得而学之”。如能这样做，他很有信心地说：“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才之众，竭其聪明智力，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而奈之何甘于自域也！”^{③③}

一八九三年刊行《盛世危言》(5)时，在作为哲学观点的首篇《道器》之后，紧接着就是《学校》《西学》。在甲午战后新修订的《危言》(14)中，不仅把“学校”“西学”仍然放在很突出的地位，而且郑观应认为当今“强邻环伺，祸患方萌”，需要人才更为迫切，在培养人才问题上也更不能“拘守成法”。^{③④}他说：“国之盛衰系乎人”，要培养有实际才干的人，必须废除八股科举取士，广办学校，“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③⑤}郑观应惟恐人们对废时文重西学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又用最明确的语言呼吁：“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③⑥}这在当时多数人拒绝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沉溺于时文的情况下，把学习西学提高到如此重要的地位，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适应发展中的中国近代工业急需技术人材的要求，郑观应认为必须加速培养人才，除办正规的学校之外，还要另寻途径。他于一八九六至九七年间，正在汉阳铁厂任总办，在实践中深感技术人才之不足，而提出在铁厂设立一结合机器生产的大学堂的建议。这个学堂的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他说：这种“就局厂之机器可即事以指授”的教学，一定能“事半功倍”，一定能较天津江南各处所设之学校收效更速。^{③⑦}这样做的后果，并可“为将来替代洋匠地步，月薪可减，钢铁货成本自轻，又免为他人挟制。”^{③⑧}这在当时国家主权不独立的情况下，是一定的反侵略爱国思想的表现。

为了有效地进行商战，于迅速培养有实学的人才之外，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自己制造机器。郑观应认为要使商务能操胜算，除税务上争取与洋货一样的优待条件外，更重要的是生产领域中降低

成本, 以使价廉物美, 即所谓“有工以翌商”。他说:“商务之盛衰, 不仅关物产之多寡, 尤必视工艺之巧拙。”工何以能“巧”? 主要在于使用先进的机器技术。郑观应对于中国技术落后情况极为不满。还在七十年代前期, 他即以造船为例批评技术落后的情况说:“华匠纵多巧思, 粗窥奥窔, 而限于闻见, 未能曲畅旁通。成本既多, 程功又缓, 一船甫就, 而西人已别出新奇, 远胜旧制。如是而欲其相敌, 盖亦难矣。”^{③⑤}经过二十年的实践, 郑观应更明确认识到商战与先进技术的关系, 他说:“论商之原, 以制造为急, 而制造之法, 以机器为先。”

郑观应是一个有心救时的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思想家, 他在民用机器生产上主张仿造西方陈旧的东西, 同时他看出日本学习西方有成效, 极力主张在工艺制造上以日本为借鉴。他说:“考日本……土产无多, 年来效法泰西, 力求振作, 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极力讲求, 招商集股设局制造, 一切听商自主, 有保护而绝侵挠, 用能百废具举”, 发展很快。郑观应综合概括日本的经验说:

“夫日本商务既事事以中国为前车, 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我为其拙, 彼形其巧, 西人创其难, 彼袭其易。”^{③⑥}

这就是说, 西方化很大力研究试验成功的科学技术成果, 日本袭取过来就用。日本既然这样做有显著效果, 郑观应说, 我们中国“何不反经为权, 转而相师”呢? 如果“转而相师”, 那“以我之地大物博, 人多财广, 驾而上之犹反手耳。”^{③⑦}虽然郑观应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一些, 尤其是要企图通过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来实现他的主张更是一个空想, 但他的以日本为借鉴, 学习日本的“西人创其难, 彼袭其易”的办法的思想, 是可取的。

(四)

郑观应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反对和抵制的一面, 也有适应和依靠的一面。这在办企业中所要采取的形式上明显地表现出来。

郑观应认为要企业发展得快和好, 主要应该是商办, 但有时也说官督商办是最好的形式, 有的企业则说官办商办可以并行, 有时对于某些企业则主张华洋合办, 这些应该怎么理解呢?

在开采五金煤铁等矿方面, 郑观应从维护利权出发, 看到泰西各国对“中国矿产饶富无不垂涎”的事实, 认为亟宜“取地中之所有, 供人世之所无”。由谁来开采呢? 他早在七十年代初的主张是:“或议民采官收, 或由部给照仿牙帖之例准民开采, 或竟由官办。”^{③⑧}一八八〇年新刊《易言》(36) 时把“竟由官办”删掉了, 否定了“官办”。一八九三年定稿的《盛世危言》(5) 则认为官督商办最好。他说:

“全恃官办, 则巨费难筹, 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 则土棍或至阻挠, 兼恃官威, 则吏役又多需索, 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 不得有心隐漏; 官稽查以征税, 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 二弊俱去。”^{③⑨}

郑观应的“官督”主张, 仅仅是为了避免土棍的阻挠和吏役的需索, 是藉官以“护商”, 所以他在《船政》篇中明确说到:“开矿之事, 似宜商办而官为护持。”郑观应所理解的官督与清官僚洋务派头目们企图操企业的控制权以“病商”的官督是不同的。当郑观应发觉清政府的“官督”不护商而病商时, 愤而批评他们是“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权重, 得以专擅其事, 位卑而权轻者, 相率而听命。公司得有盈余, 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俎代谋。”从而提出完全商办的主张, 他说:

“凡通商口岸, 内省腹地, 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 一律准民间开设, 无所禁止, 或集股或自办, 悉听其便。全以商股之道行之, 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④①}

这些话是在甲午战争以后讲的, 说明郑观应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进步的。

郑观应在甲午战争之后主张商办或中外合办是最激烈的。在造船工业方面, 本来他主张官办商办并行。船厂官办已是既成事实, 他看到“有华商集资附入外人(造船)公司股份不愿居华商之名”的情况, 提出由“众商公推一人总司其事”, 招商股开设船厂, 这些商人一定“视为身心性命之图, 制造必精, 程功必速, 成本必廉, 虚费必省。”官局商局并行不悖。”^{④②}郑观应企图通过商办船厂的竞争或可以改变官厂的腐败面貌, 挽回一些利权。但是, 上海福州的造船厂“既不造船, 又无商船修造, 岁修兵船无几”, 郑观应大胆地提出了福州官办船厂必须招商承办。早在福建船厂刚造成几艘轮船的时候, 郑观应就看出官办船厂的缺陷, 他主

张“改官造为商造”，使“甘附洋商之尾”的华商们来承办，他说：“与其官造之而仍望商用之，又何如从此而令商造乎？”^{④②}这个观点显然代表了民间资本投资于造船工业的要求，但没有反映到《易言》中去。甲午战后郑观应心目中的“商”是谁呢？他说是“归招商局与洋人合股承办，可期两有裨益。”^{④③}为什么要华洋合股？郑观应讲得很明确：“事属创办，非洋工师有股不能洁己认真，亦非洋商有股不能招徕生意。”^{④④}一个是依靠洋工程师的技术，一个是因洋人船多可以招徕生意。当然利用外国的资金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要由招商局承办？这与他本人以及他和盛宣怀的关系联系着的。郑观应讲这些话的时候，正是盛宣怀企图并已经承办汉阳铁厂、督办铁路公司等企业的时候。盛宣怀自一八八五年督办招商局以来，即以此为据点积极扩大经营范围。一八九二年起郑观应再次进招商局经办局务，他积极地为盛宣怀也为自己谋经济利益，壮大经济实力地位，以招商局为基地伸展到其他行业去。由招商局承办，显然是适应盛宣怀集团利益的要求。

在甲午战后的五六年间，是郑观应提议华洋合办最频繁的时候。为了得巨款解决汉阳铁厂焦炭来源的困难，以使铁厂能持久下去，说“与其借洋款，不如与洋人合股”^{④⑤}；为了避免各省矿产为外人之“捷足者先登”，主张“集华商西商”股分酌办；对铁路干线也认为“中西股商合力招股分段承办”^{④⑥}为好。为什么这时郑观应极力倡议中外合股办企业呢？除上面所讲的争取外国技术帮助和招徕生意之外：

第一，甲午战争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帝国主义于军事、商品侵略之外，掀起了掠夺矿产、铁路等权利和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郑观应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说：“我国势将瓜裂，恐难挽为（回）”^{④⑦}，必须抢在外国侵略者前面购定全国好的矿藏并着手开采，但所需资金甚巨，“招洋商合办”是可行的办法之一。他所拟的《宣城东流煤矿华洋合股章程》十六条中，强调“该矿为中国自主之产”，定为中外股分各半，五十年后即以全部产业无偿地交给中国。^{④⑧}

第二，为了有效地反对沙俄的军事侵略。郑观应看到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筑成后，俄军从“新疆伊犁吉林东三省等处，不过数日，重兵可分驰并集。兴言及此，曷胜悚惧。”^{④⑨}他着急了，他惟恐“缓不济急”，于是主张中外合股分段承办，以加快铁路的建筑，庶能在军事上对付俄国的“分驰并集”。

第三，郑观应认为“与洋人合股，得其整顿，纵有军务亦不致碍。”^{⑤⑩}他的意思是说，与洋人合股经营，即使国家被瓜分，企业的经营可以如故，资本家的利益亦可以照旧获得。这种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国家被瓜分了，主权没有了，利用有洋人股分的什么公司的名义能保持矿产权吗？能保持自己的经济利益吗？尽管郑观应多次讲华洋合股“主权操之在我”，答复只能是否定的。利用外国资金以发展本国的经济，这只能在国家民族独立自主的条件下才能做到，才可能使企业的“主权操之在我”。

由此可见，从前两点看，郑观应是从爱国救时的观点出发搞华洋合办的，有积极的意义，而后一点实际上是在国家瓜分危机面前转而想托庇于洋人以求利。表面上是矛盾的，实际上恰恰是郑观应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必然逻辑。

总的说来，郑观应是倾向商办的，而且态度上也愈来愈明确，应该说他是在前进的，即使是甲午战争之后他大谈与洋人合股经营，也不能认为是后退或堕落了，而是在救时的迫切心情下不得已采取的办法。至于想托庇于洋人以求利，那是资产阶级的劣性表现，是郑观应的阶级局限性。

据上所述，郑观应在官督商办、商办或华洋合办等主张上，同他本人及其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同其所在的盛宣怀集团的利益，密切攸关的，这在一九〇三年以后郑观应反对轮船招商局官办，主张商办，但仍不废官督这件事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当了直隶总督兼署北洋通商大臣，他从盛宣怀手里将轮电二局夺归北洋掌管，郑观应很气愤，一则曰袁世凯“翻云覆雨”，“党同伐异”，他告诉盛宣怀说：“职道固穷守节，安命待时，不献一策，不发一言”^{⑤⑪}；再则曰：“今政府不念当年办事者煞费苦心，两局皆系商股，竟视为北洋私产，准直督任用私人”^{⑤⑫}。以表示他忠于盛宣怀反对袁世凯。郑观应自一八九二年以后就与盛宣怀这个督办利害与共，他反对袁世凯控制下“官权益重”，并不反对盛宣怀这个“官督办”，在郑观应的心目中，招商局以盛宣怀为主郑观应为辅的“官督商办”是最理想的。他于一九〇八年向邮传部献策说：招商局“整治之策奈何？确守官督成案，实行商办主义，部派之员至多以正付坐办二人为率。”^{⑤⑬}袁世凯专以刮钱为职志，根本不作如何发展实业的打算，以致机构臃肿，管理腐败，郑观应表示反对，是有一定的积极性的，但他把盛

宣怀作为商办企业的救世主,不能认为是可取的。为了对郑观应作出比较正确的评价,还必须对他与盛宣怀的关系加以论述。

(五)

郑观应把盛宣怀看作是他的“商战”主张的实现者,盛宣怀则把郑观应看作是他经营近代工商业的得力帮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盛宣怀正大力勘查矿产,一八八一年前后开平等矿股票大涨,郑观应多次致书在山东烟台勘矿的盛宣怀,打算与盛联名稟请集股在山东开矿。一八八三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上海,股票下跌,银根奇紧,郑观应因上海织布局亏欠赔款请盛宣怀“垂怜苦况”,盛则“慨允”为之“力挽危局”。郑观应得以结案解脱,得盛之力殊多。郑观应后来回顾盛宣怀对他的“垂念穷交,不以盛衰有异代为了结”的恩情,感激零涕^⑨。亏欠了结之后闲居广东穷途潦倒的郑观应,诚心诚意地投靠盛宣怀了。他致书盛宣怀说:“如阁下于粤处有事差委,尽可效劳。每念鲍叔高谊,不悉何以报之。”^⑩实际上盛宣怀在郑观应提出要求之先已为之张罗,他已稟请李鸿章扎委郑观应总办开平粤局事宜了。郑观应经理开平粤局事务不久,即重入招商局。从此,郑观应为盛宣怀也为自己不遗余力地谋利了。

郑观应在一八九二年重入招商局,一八九六、九七年又先后总办汉阳铁厂、总理粤汉铁路事宜,都是盛宣怀一手提携的。郑观应按照《盛世危言》中的一整套理论认真经营企业并对盛宣怀作出贡献外,从一八九三年起为招商局和盛宣怀个人大事购买地皮;马关条约后郑观应预见市场将有大的发展,土地价格必将迅速上涨,在上海的吴淞、杨树浦、虹口一带地方,通过英人密尔登大规模秘密地购买土地;同时也在烟台、汉口等地为盛宣怀和招商局买地。郑观应为盛宣怀买了多少土地没有统计,可以肯定在买地上盛宣怀获利是很多的,单吴淞铁路旁拟购的四、五千亩,郑观应估计可获利百万。而郑本人也就中购买了一些土地,有一次郑观应想要盛宣怀代买土地,对盛说:我与“密尔登前代公经手所买之地,均属便宜”,故敢“冒渎”恳请代买。^⑪其他地方郑观应依靠盛宣怀而附买的土地还有不少,获利亦厚。据郑观应一九〇六年说:“汉口地价除代灼帅清还庄欠,所余可敷三年家费。感谢无已。”^⑫郑观应在利益上对盛宣怀的依赖远不止此,盛宣怀除在不少企业中为郑观应留股票数额外,单招商局帮办一席,据经元善一八九七年揭露,每年获利是很丰厚的。经元善曾问盛宣怀:“陶斋是否舍轮专铁?”杏公笔谈云:“铁甚苦,轮花红外岁入九千金,岂可使其舍甘就苦。”^⑬从利益上说郑观应本是不愿去办理铁厂的,盛宣怀也不会使其“舍甘就苦”,不过要郑观应暂时兼理铁厂,以事整顿而已。从一八九二年后的二十余年间,郑观应往往以盛宣怀的进退为进退。九十年代盛宣怀承办了铁路、纺织、银行等企业,是很得志的时候,也是郑观应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候,一九〇三年以后,袁世凯“以石压卵”之势“屏逐”(盛宣怀的用语)盛宣怀于轮电二局之外,盛宣怀赖以发迹的据点被袭击,郑观应也引退到广东去了,或在粤汉铁路公司办理一些事务,或是到澳门隐居起来。一九〇九年以后盛宣怀重新主持招商局,向他认为“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⑭的郑观应借箸代筹,请他到上海来整顿局务,说“公来方能鞭辟入里”^⑮。郑观应又活跃了起来。

由于郑观应与盛宣怀在经济利益上联系在一起,很自然的对盛宣怀的看法与同时期不少人不同。不妨举几个例子。

盛宣怀长期是官督商办企业轮电二局的督办,他当然是代表官去督理的。但他后来为了反对北洋夺这两个企业时,又说他是“商督办”,他对人说:“从前下走办理轮电,股分皆我招,日与华商周旋,名为商人之督办,实则为公司之首董”。所谓公司之首董他的解释即所谓“商督办”。^⑯事实是,当盛宣怀需要以官的身分出现时他就是“官督”,须要以商的身分出现时他就是商办者。郑观应对盛宣怀这种两重的适应性从不表示异议,而与郑观应同在轮电二局共事的经元善、谢家福、严作霖等民族资本家就表示批评的态度。经元善说,上海电报局为官督商办企业,“但督者与办者截然分为两事,不知杏公自命是官督乎?是商办乎?任官督尚忽于统筹全局之扩张,任商办犹未能一志专精乎事功。”^⑰谢家福则借苏州人的话说盛宣怀搞的官督商办就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朦官”^⑱。这正是对盛宣怀维妙维肖的刻画。严作霖不仅在官督商办上与经、谢有类似的言论,而且还直截了当地对盛宣怀说:轮船、纺织等企业“他人不准入局,此为垄断”,要求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听民自为”。^⑲郑观应呢,尽管他与盛宣怀对官督商办的理解不一致,但从未见郑对盛有一言的批评。

其次, 经元善批评盛宣怀“独揽轮船、银行、铁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政, 所谓一手捞十六颗夜明珠, 正坐务博不务精之弊。”^⑤盛宣怀独揽这些重要企业对民族资本主义起排挤作用, 经元善反对是对的, 但郑观应恰恰是盛宣怀“一手捞十六颗夜明珠”的帮手。他多次建议盛宣怀抓紧轮电不放, 抓铁路、铁厂、煤铁五金矿等, 最好能当上商务大臣之类的官职以巩固督办的地位, 还致书盛宣怀说:“银行为百业总枢, ……与铁路、铁厂相表里, 亦属利藪, 迟为捷足先登, 诚为可惜。”^⑥要盛宣怀抓紧时机主持银行的创办。问题很明显, 盛宣怀捞的“夜明珠”愈多, 郑观应这个帮手经济活动的范围愈广, 一方面收益愈为可靠, 同时他认为实现《盛世危言》中一套经济理论的可能性也更多。为此, 在盛宣怀把这些“夜明珠”捞了不少之后, 郑观应为了帮助他对这些企业进行控制和管理, 打算专做“暗查”工作, 一九〇〇年他请求盛宣怀委派他“代为往来各埠暗查商局、电局、银行、钱厂一切弊窦, 随时密陈。”为了避免受人怨谤, 他说:“只可暗中代查, 外面须无言职, 无官守, 如局外一般。遇事密告督办, 不告别人, 而督办亦不可泄为某人之言, 使人不知其从何得悉, 钦佩精明, 且畏惧耳目之多。”郑观应把这比之为“赖侠士之密访”的“雍正之圣明”。^⑦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夕, 郑观应还念念不忘为盛宣怀干这件事。他毛遂自荐地要盛宣怀派他“如街上之巡警”般的“出巡长江各埠, ……使各分董傲惧”。^⑧这种不事生产, 以充当盛宣怀“巡警”为荣的行径, 如果说晚年堕落的话, 这倒是一个表现。

不仅如此, 郑观应还与盛宣怀一样是铁路风潮的反对者。一九一一年, 清政府在当时任邮传部尚书的盛宣怀主持下搞的实际为帝国主义所有的铁路干线国有勾当, 全国人民一致反对, 郑观应却是拥护的。并要盛宣怀密示他去京“面商”“商股之款如何还法或欲收买”^⑨等问题。待保路风潮掀起时, 郑观应为盛宣怀壮胆, 说“粤路风潮外似雷鸣, 实无大碍。办理得窍, 则迎刃而解。”在他看来只要“恩威并制”就可以解决, 那就是对“好事耸动”者给以“威”, 对跟着闹事的人给以“恩”。^⑩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郑观应的意料, 保路风潮如星火燎原越烧越旺, 尤以四川为最盛。正当郑观应沿长江西上“巡视”到四川的时候, 看到风潮高涨的情况, 他本能地为清政府和盛宣怀讲话了, 最能代表他这时的思想政治态度的, 是他在四川写的献给盛宣怀的一首五言古诗, 兹摘录其中的一段: ^⑪

……

舍舟欲登岸, 铁路事靖否? 强邻虎视迫, 速办不可苟。邮传筹大局, 商办归国有。包办免虚糜, 利权非外授。工程有限期, 材料无克扣。势须借外债, 为国而蒙垢。吾侪休误会, 细究知良莠。……同室若操戈, 尤恐招外丑。立宪须得人, 和衷无掣肘。君民共一心, (郑原注:“上下均知爱国”) 何虑强邻取。(郑原注:“蜀湘误会借款筑路为外人所有”) ……

诗中所表示的立场, 完全与广大人民群众是对立的, 而与清政府盛宣怀却是一致的。由于立场的错误, 他说盛宣怀是“为国而蒙垢”, 说人民反对卖国的国有的行动是什么“同室操戈”, 说人民的反侵略行为是要“招外丑”。真是典型的颠倒是非! 为什么会这样? 一方面与他站在同人民对立的立场有关, 同时与他长期来往以盛宣怀的是非为是非密切联系着的。

郑观应实际上是以盛宣怀作为自己变法主张的知音者的。办学校, 学西学, 办纺织, 炼钢铁, 开矿筑路, 开设银行, 等等, 从表面上看, 盛宣怀搞的这一些, 都是《盛世危言》中要实行的东西。“士为知己者用”。这是郑观应对盛宣怀一再表白的心迹。加之盛宣怀不断分给郑观应企业利润的余沥, 所以郑观应就很自然的以盛宣怀的意志为转移了。

然而, 郑观应毕竟是一个要反对侵略以救世为志并身体力行的思想家, 在不少问题上与盛宣怀是有分歧的, 其中实行立宪设立议院就是一例。盛宣怀也谈变法, 在戊戌变法前他的所谓变法, 只变户政、兵政、工政, 至于吏政、礼政、刑政都不更动。与郑观应的变法显然不同。由于盛宣怀多次推崇《盛世危言》, 郑观应天真地认为, 盛对他的议院制主张也是赞成的, 故早就要求盛把立宪作为变法的内容说:“欲维新先立宪法, 欲兴商先定商律。”一九〇五年远在广东的郑观应在报纸上看到盛宣怀不赞成立宪的报导时, 马上写信给盛宣怀说:“今阅日报有论官保不以立宪法为然者。窃思官保绝顶聪明, 老成历练, 必无是言。”^⑫他要求盛宣怀在立宪这个“有关国是之大者”“以去就争之”。即使这时郑观应的立宪主张已不象戊戌变法时期有什么进步意义, 盛宣怀还是不敢对郑观应明确表态赞同。到一九〇九年盛宣怀才说了“大约立宪既能预备, 岂有轮船会社反愿官办之理”^⑬这句肯定立宪的话。这一年也是郑观应向清政府上万言书请求迅速立

宪的时候。郑与盛之间在立宪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是一致或接近了，但这时清政府搞的假立宪是完全反动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六)

开设议院实行立宪，是郑观应的一贯主张，但在政治上各个时期的作用却是不同的。学术界在评价这个问题上也有一些争议，特别是一九〇〇年郑观应把设议院放在《危言》(8)中首要的地位，主张马上实行立宪。有人说这主要是维护清朝统治镇压义和团的反动措施，是“迅速堕落的表现”，也有人说尚有一定的进步性。

郑观应认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自强。必须设议院以保证他的主张的实现。他早就说有了议院“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可以预期矣。”^④后来郑观应又进一步概括地说明了他的观点：“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⑤他激昂慷慨地说，英国日本实行君主立宪都有明显的成效，在中国“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尚不可亟行哉？噫！慎矣！”^⑥在甲午战争前这样激烈的要求在中国行议院制的言论还没有第二人。甲午以后郑观应把最激烈的“而犹谓中国尚不可亟行哉？噫！慎矣！”删去，改为“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惟必须行于广开学校人材辈出之后，而非可即日图功也。”^⑦口气缓和了，并把本来放在第四篇的《议院》一下子列入第二十六篇，放在很次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论者往往很贬郑观应。照我看，不一定是郑的真实思想，一方面固然与康梁等人为了避免维新运动的阻力把设议院暂时不提到日程的思潮有关，同时有可能是迎合江苏藩司邓华熙的意见修改的。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邓华熙把《盛世危言》(5)进呈光绪帝，随即写信告诉郑观应说：“已代删正，缮写进呈。”^⑧删正哪些地方没有说明，但郑观应的上述删改却与邓华熙的观点一致的。邓华熙在推荐《盛世危言》的奏稿中说：“广学校以选人材，设议院以联众志”，“无学校之真，则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无议院之设，则上下之情隔，粉饰之弊多。”育人材优先于设议院，是明显的。另外，甲午战争中锺天纬、经元善等企图通过募义饷兴义兵以加重民权，从而最终达到立议院目的的做法，郑观应颇不以为然，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这样转弯抹角，他说：“在中东一役之前，不得不如此婉转，今已言路大开，何妨明目张胆为当轴言之哉！”^⑨岂有批评别人不敢“明目张胆”与当轴谈立议院的郑观应，反把自己的著作修改得比甲午前缓和婉转之理？郑观应的这种修改非出本意，似无疑义。基于此，就容易理解八卷本的修改了。

一九〇〇年新刊的八卷本《盛世危言》，把《议院》又一下子提前到第二篇，放在突出的地位。尽管正文仍是原样未动，但附录的言论却要求马上设立议院，郑观应并斥责那些要等到“人材辈出”之后才能立宪的人为“寻常人之见”^⑩。关于这一点，论者也往往很贬郑观应。不错，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清反动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郑观应急于要设议院以收民心，他说：“不有议院何以使亿万姓惟一心乎？”他甚至希望逃往西安的清最高统治者回京及早实行立宪，他在一首诗中说：“恭祝翠华回驭早，日新盛德庆风同。”^⑪这种要把民心统一到维护清反动统治之上，当然是应该贬的。但是他说：“强邻之畏我者民心固结，若此时不建，迟至各省海疆被西人占据，恐欲设而不能。”^⑫因此，郑观应的立宪以收民心又是为了对付“强邻”紧逼的。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还没有兴起，要通过立宪，收民心以对外，应该说，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而且，郑观应在这时把设议院放到突出的地位，是出于对专制主义的极端痛恨和高度的救国热情。他说：“从前民间举动，虽合公理，顺人心，苟与政府意见相背，小则斥为惑众，大则指为叛逆。自疆吏以至州县，但知仰承意旨，虽明知其冤，不敢代白。此奸佞得以弄权，庸臣得以误国。若设议院而公是公非，不难扫除积弊。”^⑬这种对专制主义黑暗统治的揭发是很深刻的，要求改变专制实行微小民主的立宪制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而总的目的是为了救国，虽没有达到民主主义的水平，却也是无可非议的。

我认为，主要应该贬郑观应的是他围绕立宪问题对待一些人和事的态度上。

第一，如上所说，当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还是一种思潮的时候，郑观应在这种思潮中不仅是有比较完整思想体系的一个人，而且还是言论比较激烈的一个人。“公车上书”之后改良主义从一种思潮变成政治运动的时候，照理郑观应应当是这个运动的参加者。但事实是他离政治运动远远的，还在一八九七年就对盛宣怀

说：“康梁办事毫无条理，不知度德量力，将来必有风波。”^①表示与这个政治运动无关。确实，郑观应与戊戌维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牵连。戊戌变法失败，康梁组织保皇党，改良变法再也没有进步意义的时候，他却积极行动起来企图通过盛宣怀这些人搞立宪。到清政府搞假维新的时候，郑观应更积极了，他一再请求迅速立宪。这难道还不耐人寻味吗？

第二，郑观应对待改良派的态度也是很糟糕的。他在戊戌变法中离运动远远的，变法失败了，他对康梁的行踪却很注意。他听说梁启超乔装到上海，马上报告盛宣怀说：“顷闻梁卓如扮日装到沪，想小田切总领事必知确否？今日相见可询之。不可说闻自何人。至祷。”^②这不是要置梁启超于死地吗？其次，郑观应对待民族资本家而有改良主义思想的经元善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经元善在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与沪上绅民联名致电总署，要求被幽禁的光绪帝临御执政，触怒了西太后，遭到清政府的追捕而逃亡澳门。李鸿章电盛宣怀，要他“密询郑陶斋”^③，了解经元善的行踪，郑观应照办，报告经元善“往来港澳”。盛宣怀称赞郑观应报告经的“踪迹甚符合”。^④经元善请求恢复光绪帝的权力有什么意义我们姑且存而不论，但郑观应参与对经元善的迫害是可鄙的。

以上两点确表明郑观应是堕落的。绝不是如有的人所说的郑观应后期信道拜佛是堕落的表现。因为信道拜佛因果迷信思想，在他年轻时已是如此，有人在郑观应临终前就说他在这方面是“六十年如一日”。事实上这在《救时揭要》中已有反映，他在《揭要》序言中不是说“研性理则辑道言精义，论感应则集福报诸书”吗？而《陶斋志果》等迷信书籍也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刊行了。

总起来看，郑观应在甲午战争以后的政治行动同他的政治思想是有距离的，有时甚至是相矛盾的。这是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软弱性的表现，也和他于一八九二年进入盛宣怀集团并逐步陷得较深有关，他与大官僚大买办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人们称他为“武进党”、“盛党”，他实际上也是以“武进党”、“盛党”自居，处处以盛宣怀的意志为转移。一旦革命运动高涨，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高涨，他同盛宣怀等人一起拥护清政府的假立宪，反对辛亥革命，就不足为奇了。这是郑观应的悲剧。但郑观应最终还不失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知道，要救国必须发展近代工商业，但始终主要依靠盛宣怀，他意识到“政治不改，实业万难兴盛”^⑤，但始终跳不出君主立宪的圈子，终于对清政府假立宪也表示拥护。在袁世凯窃取政权以后国事更坏，他鄙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⑥他厌恶贪官污吏和军阀混战，他担心这样下去没有御外侮的能力了。兹抄录郑观应临终前的一首诗^⑦以结束本文。

当关阻虎兼狼，兄弟无端痛阅墙。

民迫饥寒沉苦海，官争权利为私囊。

只愁罗掘中原尽，难御交侵外侮狂。

鹬蚌相持渔得利，蜃楼变幻几沧桑。

可谓救国救民的心情溢于言表！

一九七八年七月初稿，同年十一月下旬在上海师范大学校庆科学报告会讨论定稿。

① 关于郑观应的生卒时间，他自己从未说过出生于那一年，在他的著作里涉及到年龄时，说法不一，矛盾百出。于是学术界众说纷纭，有的人定为一八四〇——一九二〇年，有的定为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年。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二日，邵循正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论郑观应》一文中，又提出一八四四——一九二一年。邵先生认为生年定为一八四四年，与“别的材料冲突，悬疑待决”。这是学者的慎重态度。我在上海图书馆的有关郑观应的资料中，找到了江西补用县丞何庚堂于一九〇六年为郑观应算命留下来的“生辰八字”：壬寅、丁未、甲午、甲子。经推算，郑观应是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子时生，即公元一八四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生。经过多方面核对，这可以作为郑观应出生时间的定论。至于卒年，一般定为一九二一年。但据我所知，郑观应于一九二〇年还在与轮船招商局其他商董对各分局发信指示工作，辛酉（一九二一年）上元日写了《待鹤山房唱和集自序》，同年春写了《致轮船招商局董事会书》一封长信，此后再没有看到他的作品和活动。是否就在这一年去世，并无确切依据。根据郝延平著：《十九世纪中国买办：东西文化的桥梁》（一九七〇年哈佛大学英文版）第八章注释95，说郑观应于一九二二年还能给他的妻子写墓志，一九二三年死于澳门。暂定待考。

② 郑观应：《复考察商务大臣张弼士侍郎》，《盛世危言后编》卷八，又见《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唱书》。有人说郑到上海是一八六〇年，不确。

③ 郑观应：《救时揭要序》，见《盛世危言后编》卷一五页三。

④ 《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唱书》。

- ⑤ 盛宣怀等：对苏报毁谤郑观应的答辨，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资料（下简称“盛档”）。
- ⑥ 《危言》(14) 凡例第三条。
- ⑦ 《救时揭要序》见《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五。我所看到的《救时揭要》系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年）仲春刻本，书中内容大都反映十九世纪六十年的情况，它的序文与《盛世危言后编》所收录的序文基本相同，但有个别重要区别，如前者有“随所听闻，频登《申报》”之句，这年的《申报》确登有郑观应几篇文章，有的即是《揭要》中所收录者。书首余治的“前言”和郑的“自序”，都是一八七二年所写。疑无一八六二年《救时揭要》的版本。存疑待决。
- ⑧ 《易言》(20) 郑观应自序写明是“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中秋日”，但书的第一篇《公法》中说到“烟台条约强减中国税则”的话，《烟台条约》订于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可见《易言》(20) 的定稿与刊行当在一八七六年冬。
- ⑨ 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
- ⑩ 因为一八七三年三十六篇本《易言》未曾见过，这里以一八八〇年《易言》(36) 为依据。
- ⑪ 郑观应：《论边防》，《易言》(36) 下卷页一。
- ⑫ 见《垦荒》，《危言》(5) 卷三、《铁路》，《危言》(5) 卷四。
- ⑬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
- ⑭ 盛档，《盛宣怀致郑观应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
- ⑮ 《新闻日报》一八九七年三月二日。
- ⑯ 《危言》(14) 凡例。
- ⑰ 一九二〇—二一年印行的《盛世危言后编》，大多是谈一些具体问题的书札、企业章程等文的汇编，不是前一个《盛世危言》的续编或修订。
- ⑱ 《易言》(20) 郑观应自序。
- ⑲ 《易言》(36) 王韬序。
- ⑳ 郑观应：《民团》附论，《危言》(5) 卷五。
- ㉑ 郑观应：《海防下》，《危言》(14) 卷九页九——一〇。
- ㉒ 王韬：《治中》，《弢园文录外编》卷一页二〇。
- ㉓ 郑观应：《论边防》，《易言》(36) 下卷页三。
- ㉔ 郑观应：《垦荒》，《危言》(5) 卷三。
- ㉕ 郑观应：《防边中》，《危言》(5) 卷五。
- ㉖ 郑观应：《防边上》，《危言》(5) 卷五。
- ㉗ 郑观应：《边防六》，《危言》(14) 卷一〇页一九。
- ㉘ 郑观应：《商战》，《危言》(5) 卷三。
- ㉙ 以上引文均见郑观应：《西学》，《易言》(20) 页二九——三〇。
- ㉚ 《西学》附论，《危言》(14) 卷一页三三。
- ㉛ 《学校》附录《德国学校规制》，《危言》(14) 卷一页九、一八。
- ㉜ 《西学》附论，《危言》(14) 卷一页三二。
- ㉝ 盛档，郑观应：《拟设钢铁冶炼学堂说帖》，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 ㉞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
- ㉟ 郑观应：《船政》，《易言》(20) 页三九。
- ㊱ 郑观应：《商战》，《危言》(5) 卷三。
- ㊲ 郑观应：《商战》，《危言》(5) 卷三。
- ㊳ 郑观应：《开矿》，《易言》(20) 页一七——一八。
- ㊴ 郑观应：《开矿》，《危言》(5) 卷四。
- ㊵ 郑观应：《商务二》，《危言》(14) 卷三页八——九。
- ㊶ 参见《船政》，《易言》(20) 页三九，《易言》(36) 上卷页二九。
- ㊷ 郑观应：《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救时揭要》同治十二年刻本。
- ㊸ 郑观应：《船政》附论，《危言》(14) 卷八页五九。
- ㊹ 郑观应：《船政》，《危言》(8) 卷六页五二。
- ㊺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 ㊻ 郑观应：《铁路下》附论，《危言》(14) 卷六页一九。
- ㊼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密函》，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
- ㊽ 盛档，郑观应：《宣城东流煤矿华洋合股章程》光绪二十五年。
- ㊾ 郑观应：《铁路下》，《危言》(14) 卷六页一七。
- ㊿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

- ⑧1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⑧2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四日。
- ⑧3 盛档,施肇基、郑观应等董事:《呈请招商局商办事》,光绪三十四年。
- ⑧4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 ⑧5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 ⑧6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
- ⑧7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
- ⑧8 盛档,《经元善致口口函》,光绪二十三年。
- ⑧9 盛档,这是盛宣怀在《唐国泰、谭国忠致盛宣怀函》的信封上的一句批语。原句是“陶斋为招商局必不可少之人”。
- ⑨0 盛档,《盛宣怀致郑观应函》,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 ⑨1 盛档,《盛宣怀致陆定庐侍郎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⑨2⑨3 盛档,《经元善致郑观应等函》,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
- ⑨4 盛档,《严作霖致盛宣怀函》,约光绪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 ⑨5 盛档,《经元善致郑观应等函》,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三日。
- ⑨6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 ⑨7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五日。
- ⑨8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 ⑨9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三年四月十七日。
- ⑩0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三年六月三十日。
- ⑩1 盛档,郑观应:《蜀路闹事感作》,宣统三年中秋。有些“郑原注”节去。
- ⑩2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 ⑩3 盛宣怀:《致郑陶斋函》,宣统元年闰二月初六日,《盛宣怀未刊信稿》第一六〇页。
- ⑩4 郑观应:《论议政》,《易言》(36)上卷页三八——三九。
- ⑩5⑩6 郑观应:《议院》附论,《危言》(5)卷一。
- ⑩7 郑观应:《议院下》,《危言》(14)卷五页五六。
- ⑩8 见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
- ⑩9 郑观应:《募义饷兴义兵公启·跋》,见经元善著:《居易初集》卷一页五四。
- ⑪0 郑观应:《致盛京舆论变法宜设上下议院书》,《盛世危言后编》卷三页五。
- ⑪1 《待鹤山人六秩寿诗唱和集》卷上:这两句到一九二〇年收入晚年纪念诗集时改为“一瓣心香求立宪,唐虞盛世亚欧同。”
- ⑪2 郑观应:《议院下》附录:《答某当道设议院论》,《危言》(8)卷一,页一六——一八;又见《盛世危言后编》卷三《致盛京舆论变法宜设上下议院书》,文句微有不同,主要的在“不建”后有“缓以时日,正合外人之意”一句。
- ⑪3 郑观应:《议院下》附录:《答某当道设议院论》,《危言》(8)卷一;又见《盛世危言后编》卷三《致盛京舆论变法宜设上下议院书》,文句微有不同。
- ⑪4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
- ⑪5 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密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
- ⑪6 《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李鸿章未刊稿·电稿》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午刻。上海图书馆藏。
- ⑪7 《盛宣怀致李鸿章电》,《李鸿章未刊稿·电稿》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酉刻到。上海图书馆藏。
- ⑪8 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自序》
- ⑪9 何卓勋:《和郑观应诗》中注云:“洪宪称帝、张勋复辟,公皆鄙之。”郑观应在临终前一首七言古诗《专制当道叹》中写道:“欲求万世家天下,强秦洪宪今如何?”
- ⑫0 《待鹤山房唱和集》页二。

来信摘登

编辑同志:

《提灯会》(《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有几处错误:

①272页第5行“愤”应作“愤”;②272页第7行“含”应作“颌”;③272页第8行“既”应作“猷”273页注[33]同此;④273页注释[7]“?”应作“,”。

此外,原注释稿中有一处错误,是由于我查阅

原作时粗心所致:⑥273页注释[1]第2行“原诗无句读”应改作“原诗用旧式标点”。

以上五点错讹,我都有直接、间接的责任。《提灯会》是烈士遗作,此次发表时出现一些差错,我和母亲都很不安。切望挤出一小空隙,刊登启事予以更正为盼。

闻 翊 79.1.14

郑观应思想发展论

郑观应研究

177